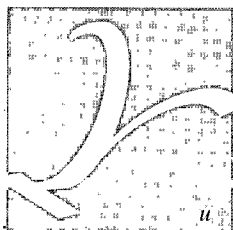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阅读俄罗斯

陈建华 著

u e d u e l u o s i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阅读俄罗斯

陈建华 著

e d u e l u o s 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俄罗斯/陈建华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321-3166-2

I.阅… II.陈… III.①比较文学-中国、外国-文集②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I0-03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042 号

责任编辑:李霞

封面设计:周艳梅

阅读俄罗斯

陈建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21,000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166-2/I·2409 定价:3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19

目 录

上辑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关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对话·····	3
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29
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	44
文化使者:东学西渐中的俄国汉学家·····	60
从《俄人寓言》到克雷洛夫寓言——谈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 译介·····	69
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	78
论“五四”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87
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14
俄苏文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命运·····	136
俄苏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潮起与潮落·····	166

下辑 作家作品解读与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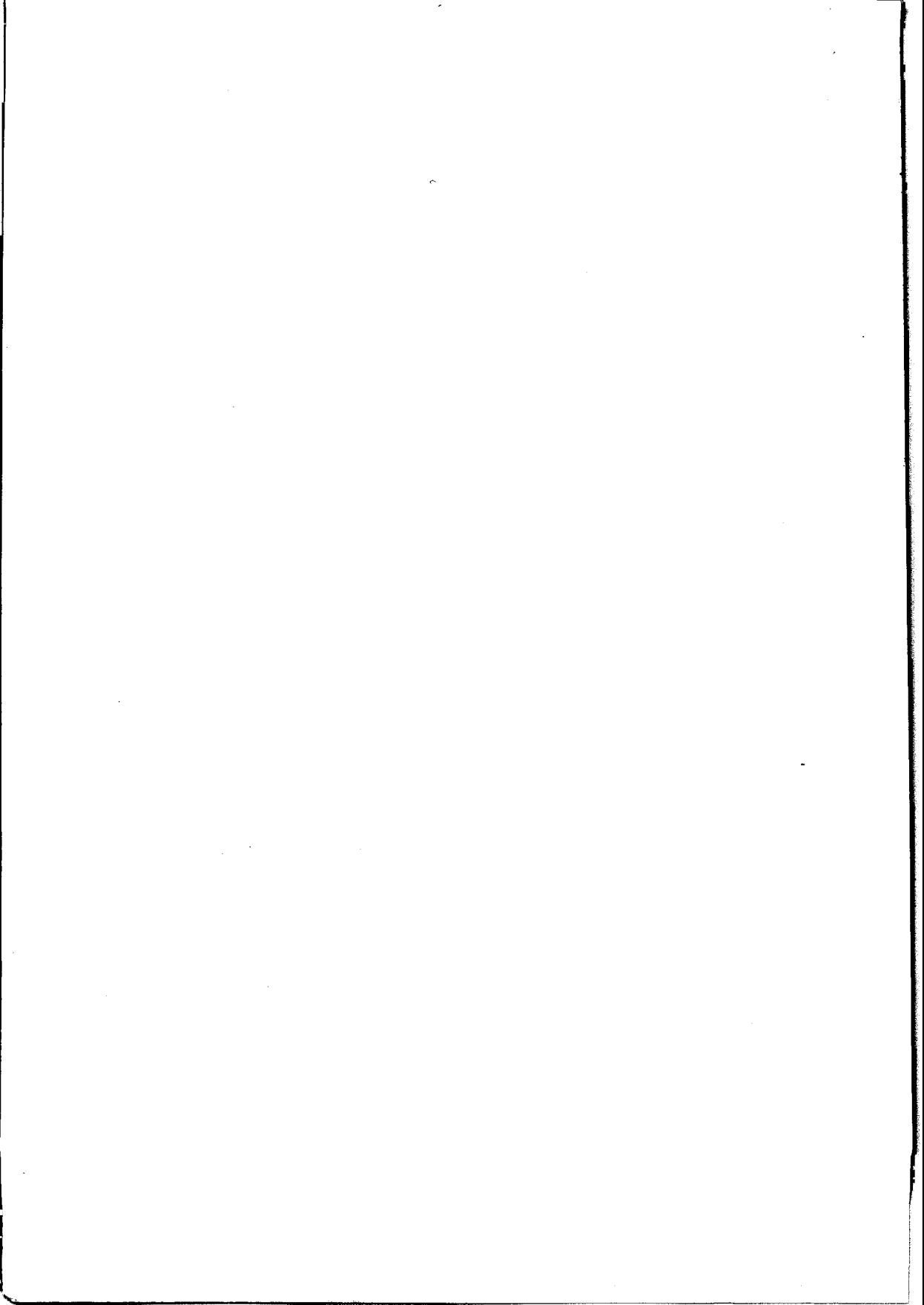
论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	207
娜塔莎形象与托尔斯泰的审美理想·····	240
《舞会以后》的结构与人物·····	246
“人民戏剧”及其他·····	250
《两重人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探索·····	259
“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析《罪与罚》·····	270
谈《死魂灵》中地主群像的塑造·····	275
评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喜剧《澡堂》·····	280
《癌病房》:特定时代的反思录·····	286

2 阅读俄罗斯

识见与偏见:19 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纪实	294
托翁的终极追求与儒道墨学说	306
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318
俄苏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324
普希金情结: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	336
走近真实的果戈理	347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屠格涅夫	359
影响·创新·民族化——谈巴金和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	373
后记	387

上 辑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 ——关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对话

2002年1月中旬,正值俄罗斯隆冬时节,我迎着漫天风雪,踩着“嘎吱”作响的雪地,走访了俄罗斯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①通讯院士,并就中俄文化交流的主题与他进行了首次对话。此后,我在广泛接触俄罗斯学者和作家的同时,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李福清先生多次会面,并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其间,我们都先后几次离开莫斯科,远赴外地。因此,直到莫斯科由银装素裹转为满目春色时,我们的对话才告结束。我根据几次对话内容并与李福清先生商讨后整理成文。

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就中俄文化交流的话题进行对话。您是俄罗斯成

^①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中文名为:李福清,1932—),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现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后任职于苏联科学院(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著作有:《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年)、《〈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年,中文版1997年)、《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中文版1987年)、《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文版1988年)、《汉文古小说论衡》(中文版1992年)、《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中文版1998年,增订本《神话与鬼话》2001年)、《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中文版1997年,1999年)等。他还编译了:《中国民间故事》(1957年,增订本1972年)、《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年)、《紫玉——中国1—6世纪小说集》(1980年)、《人到中年》(中篇小说集,1985年)、《冯骥才短篇小说集》(1986年)等。发表了大量论文,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列藏本石头记》(1986年)、《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合作,1989年)、《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合作,1993年)等。

就卓著的汉学家,不仅对中俄文化交往的历程有深入的了解,在您撰写的许多著作中还体现了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独到思考。

李:我也很高兴与您就这一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俄中学者之间进行这样的对话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您对俄中文化关系有专题的研究,在俄国也有这样的学者,譬如不久前在中国驻俄使馆举行的纪念唐代诗人李白诞辰 1300 周年暨赠书的活动上,您曾遇到过的一些俄国学者。

陈:您提到的那次活动,很有意思。参加那次活动的大多是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不少人年事已高,但他们都顶着隆冬季节夜晚的寒风,赶到了中国大使馆,情景很感人。这次活动的主办者除了中国驻俄使馆外,还有中俄 21 世纪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中国驻俄大使张德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季塔连科、科学院汉学家联合会主席米雅斯尼科夫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著名女演员邦达连科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李白的一些诗篇。那天晚上,在使馆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除了您以外,我还与索罗金、博克沙宁、谢曼诺夫、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和费奥克基斯托夫等教授和学者进行过愉快的交谈。与会的这些俄国学者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中俄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的传统,这种交往甚至在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就已经萌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史诗作者的东方想象,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史料进一步证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0 世纪中后期,强大起来的基辅罗斯将其统治逐步向东部和南部推进,欧洲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公元 1032 年至 1193 年,诺夫戈罗德王公曾六次派人越过乌拉尔山进入畏吾尔人地区。而在同一时期,由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在公元 916 年至 1211 年间建立的辽和西辽政权,疆域十分辽阔,其西北疆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而天山南路畏吾尔人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曾为西辽所控制。因此不排除在史诗创作和流传的时期,古罗斯人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接触的可能。

13 世纪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南下西征,使中俄之间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此后,中俄两国更是相互关注。18 世纪俄国在接纳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彼得大帝从德国引入汉语

人才,并派科学家来华搜集艺术珍品;伊丽莎白女皇热衷于中国文化,使俄国的艺术学出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叶卡捷琳娜女皇则在夏宫中建造了不少中国式的建筑。从1714年起,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开始向中国派遣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传教士团。不过,它客观上也促进了两国文化交往的发展,俄国第一代汉学家就出自这些来华教士及其随员之中。

在长期的中俄文化交往中,俄国汉学家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您对于俄国汉学的传统和特点有专门的研究,很想听听您的有关见解。

李:俄国汉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俄国汉学家对俄中两国文化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俄国汉学的发展与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俄国领土的重要部分在欧洲,但最大的部分在亚洲,俄国的少数民族不是斯拉夫语系的。虽然俄国从18世纪初开始逐步西方化,但是它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他西方国家有区别。俄国重视东方,较早开始进行东方语言的教学。1618年,当时的西伯利亚首都托木斯克就开始教藏文和蒙文。后来俄国又有了汉语教学。

严格说来,俄国汉学发展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1741年3月23日,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从北京回来的罗索欣(О. К. Россохин)开始在科学院教中文和满文,同时着手翻译中国的历史著作,俄国汉学由此发端。罗索欣最重要的译著是与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合译的《八旗通志》,共16册,他去世后的1784年才出版。罗索欣还翻译过《三字经》和《千字文》,可惜未能正式出版。

俄国汉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可以先看看早期的情况。您刚才提到了早期俄国汉学家与东正教教士团的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早期汉学家并非都是神职人员出身。有的是神父,如比丘林;更多的则是教士团中的随员,如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和瓦西里耶夫。当时来华学习只能走这一条路,因此每届东正教教士团中总有五六名这样的随员,这些随员中

主要是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人,如医生和画家等)。

早期的俄国汉学家往往也是满文学家。俄国汉学家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现象,陆续从中国带回了生活在北方的民族的不少文字材料。满文是早期俄国汉学家通向汉文的桥梁。满文取字母拼写方式,语法简单,对于当时的俄国汉学家来说,它远比复杂的方块汉字来得容易。俄国早期汉学家除了学习汉文外,往往都要学习满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罗索欣是先学会蒙文和满文,再学汉文;列昂季耶夫精通汉文和满文;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除汉文外,分别通蒙、藏、梵等文字。我刚才已经提到,俄国汉学家注意收集满文资料,现在俄国馆藏的满文资料不少已是孤本。就满文资料而言,目前俄国保存的数量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许多手抄本非常珍贵。

早期俄国汉学家比较注重编词典,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在这方面成就最高。他编过多部字典、词典和语法书,最有特色的是《汉俄语音字典》。编词典本身就不容易,而比丘林编的词典不是停留在汉俄文字的逐字逐词的对应翻译,而是在大量收集活生生的口语基础上编成的语音字典,这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方便,而且将19世纪中国北方方言保存了下来。

早期俄国汉学的特点还体现在它的地域性上。早期汉学家比较多的关注的是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俄中两国是毗邻而居的大国,很早就通过陆路交往,中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与俄国山水相连,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许多民族与俄国的历史文化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受到早期俄国汉学家的格外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从俄国汉学的研究阶段的奠基人比丘林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到。比丘林编译过《大清一统志》、《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等书稿,还写有《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中华帝国统计概要》和《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等著作和文章。比丘林著述中的很多材料为后人所采用,特别是那本《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

陈:早期俄国汉学家和作家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据我所知,作为中国纯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俄国的是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这是由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翻译的。译作依据的是法

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但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改名为《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 1759 年 9 月号上。译作用的是诗体,能感受到剧情的氛围,但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1781 年,有人又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这种转译、改写和改编在俄国早期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是不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当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是从法文和英文等西方文字转译的,后来也从满文转译。我认为,借助中介语言的转译是不同国家的文学在相互交流的最初阶段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你们国家最初介绍俄罗斯文学时也是这样的,不少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

应该说,俄国相对完整地译介过来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在 1763 年。《学术情况通讯月刊》该年 12 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中篇小说》的俄文译本,从英文转译而来。这篇作品实际上是《今古奇观》中的话本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原作的基本情节保留了,但细节有出入,特别是结尾与原文明显不同。原文写田氏自杀后,庄子烧掉房子并安置妻子的尸体入棺,然后“遨游四方,终身不娶。或云遇老子于函谷关,相随而去,已得大道成仙矣”。而译文改写为主角与那个用扇子扇干丈夫坟墓的漂亮妇人成婚,妻子不忠不孝,丈夫也一样,这里没有了道教思想,却有些西方式的幽默。俄文本依据的是作了改动的英文本。

1785 年圣彼得堡出版过的一本书里再次收入了这篇小说,但是从法文翻译的,与原作比较接近。这本书取名为《庄子与田(氏),或明显的不忠实》,里面共收入四篇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位无名的编者将中国话本小说与西方的中篇小说合为一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创举。因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两回事,中国文学同中国的风俗习惯一样,是奇异古怪的东西。

有些中国古代小说的俄文译本是从汉文译成满文的材料中再转译的,如汉学家弗拉德金(1761—1811)从满文翻译了章回小说《金云翘传》(当时未出版),这部小说的满文抄本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未见收藏,估计已是孤本,目前手稿藏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内,这是最早译成俄文的中国章回小说,很珍贵。

19世纪,俄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还是转译,但也开始有人直接从中文翻译。1832年,普希金为纪念亡友而出版的文集《北方花朵》中刊出《好逑传》第12回。译文前短序称赞小说:“非常有趣,内容很新奇。”这是一位尚待考证的汉学家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他译出了全文,可惜只刊出了片段。译者依据的是何种版本也不清楚,因为它与其他版本有出入。译本总体不错,但原文中的对白常常被简略,动作描写的连贯性有时也被破坏。

1835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名为《旅行家》的书,注明是“中国的中篇小说”,译者是列昂基耶夫斯基(1799—1874)。这一译本是欧洲最早的,法译本要比它晚将近半个世纪。此书出版后颇受好评,《读者丛刊》刊文称赞此书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这部小说独具一格,使我们倾倒仰慕……巧妙构思令人兴味盎然”。文章提出:“能不能给我们多提供一点中国的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呢?它们确实要比法国的小说更好。”我读了这部作品的俄文译文后,发现它是被改编成小说的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列昂基耶夫斯基是依据中国已有的改编本,还是他自己将剧本编译成了小说,现在不清楚。列昂基耶夫斯基的译本与原作在体裁、人物和情节上均有出入。如剧本从普救寺开场,小说一开始则是关于父亲丧事的描写,而这段描写更像俄国文学中的有关场景。此外,张生对法聪和尚所作的大段关于自己感情的对话,不能排除出于译者之笔。

当时的译者随意改动原作的现象并不罕见,作家和东方学家显科夫斯基的译作甚至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为“伪中国文学作品”。他在1839年发表的元杂剧《樊素,或善骗的使女》(即郑光祖的《邹梅香翰林风月》)的译作与原作颇有距离,不仅添加了人物,还改动了情节。显科夫斯基的夫人曾在回忆录中称:“他做的远比翻译为多,他是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种改编不局限于个别词句,而在整个的情节线索上。如他的译本中有这样的情节:米拉顺(写书人,原作中没有)与白敏章同上京城,希望在那里遇见仇人蒲拉林(印书匠,原作中没有)。三人在韩夫人处相遇,蒲氏将米氏的作品献给夫人,反诬米氏为疯子。夫人答应蒲氏向其女求婚,但条件是京试得中。结果,白氏中状元,娶夫人之女;樊素嫁给了米氏;蒲氏则被相爷钉在橛子上处死(这是欧洲古刑,完全不是中国式的)。这是显科夫

斯基对中国古代戏曲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上也是成功的改编。显科夫斯基还有过类似的创造性改编,如以《好逑传》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女人佼——中国逸事》。这种改编或者是“伪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两国文学交流中很有意思的现象。

陈:您刚才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介绍了俄国早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存在的转译、误译、改写,乃至“伪中国文学作品”的现象,在中国早期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在这种转译、误译和改写中往往蕴含着很丰富的和很有价值的文化现象。我在这里不妨也举中国在早期译介中的几个例子。

中国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始于20世纪初,最早翻译的名著是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那是1903年,译者是戢翼翬,在这部译作中就出现过类似的转译、误译和改写等情况。首先,译作的名字与原作面目全非,译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另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其次,该译作的字数比现在的译本少了很多,大约是现译本的三分之一。这里除了文言与白话造成的字数差异外,与译者对原作进行的删改有关。如译作删去了各章题头所引的全部诗歌和谚语,删去了译者认为次要的情节,对原作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改写,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都改成了第三人称,将所有的章目都改成了章回体形式,添加了原作中没有的内容等。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的译风的影响外,迁就清末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在介绍俄国文化时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但是当时的译者对原作进行随意改动或发挥的现象却是极为普遍的。且不说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即使是学贯中西的翻译家马君武和吴棫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译风的影响,如吴棫译的高尔基小说《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的开头部分,在对人物外貌稍作描写后有这样的文字:“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显然是译者兴之所至,随意而加。刘半农早年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乞食之兄》(即《乞丐》)也属意译之列,与原作颇有差异,译者还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早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不熟悉外国文化底蕴和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

国文”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早期俄国文学翻译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并不注重译介文学名著,而是对以民意党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虚无党小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尽管它们的艺术价值不高。除了翻译作品外,中国文坛还存在借用虚无党故事改编、改写,乃至重新创作的现象。譬如,清末文坛出现的《东欧女豪杰》一作,虽言明是创作,但不排斥有编译的成分。小说中主要描写的是苏菲亚等虚无党人为国献身的故事。小说对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曾引起清末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国读者强烈的共鸣,而以俄国女虚无党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尤其受到欢迎,恐怕与当时女权思潮的兴起也有联系。从反对专制制度的俄国女豪杰到中国女豪杰,其内在的契合显而易见。从这样的改编或借用题材进行的再创作中,确实包含着许多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您刚才的谈话中没有提到《红楼梦》,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也做过研究,并且有重要的发现,能不能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李:俄国汉学家对《红楼梦》的兴趣一向较浓。从18世纪末开始,到过北京的汉学家陆续带回俄国的《红楼梦》版本相当多。据我统计,俄国藏有约60种的《红楼梦》旧版本。1843年《祖国纪事》第一期在刊出俄国人德明的《中国旅行记》第九篇时有一附录,此附录即《红楼梦》第一回前半回。尽管只是选段,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节译。

这个德明是谁?曾经是个谜。前些年,我才发现这是一位当年随教士团来中国的矿业工程师柯万科(А. И. Кованко)。柯万科来中国的目的是调查自然矿藏,可是他来中国后发现难以进行野外调查,于是就倾全力学习汉语。他读了《红楼梦》,十分喜欢。六年后,他回到俄国,给矿业协会的负责人写了一份汇报,其中特意提到《红楼梦》:“……我被中国人的习俗所吸引。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些习俗,我读完了《红楼梦》四大函。书中极为精彩地描写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节庆活动、结婚和丧葬的礼仪……这部书译成俄文一定会受到希望了解中国习俗的人极大的欢迎,并使有志于学习汉语口语的人获益匪浅。因为这部书是用纯正的口语写成的。”矿业协会自然不会对此感兴趣,没人注意他的呼吁。很遗憾,否则《红楼梦》

的俄文全译本会提前一个世纪问世。

不过,当时汉学家们带回俄国的《红楼梦》抄本很有价值。我在1962年在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发现了一种从未见到过的80回《石头记》抄本,其中有大量异文和前所未见的批注,如第三回就有47处眉批和37处夹批。我和孟列夫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首次对这个抄本做了简要的描述,文章同时提供了俄藏《红楼梦》续作的各种古老版本的资料。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列藏本〈石头记〉》。

陈:这一发现确实重要,《列藏本〈石头记〉》影印本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曾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为是“晚近《红楼梦》版本学上的又一重大发现”。有专家研究后认为,这一抄本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舒芜先生称之为:“沧桑历尽,始赋归来,实乃书林盛事,文坛佳话。”

俄国的汉学家不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方面作出过不少成绩,而且在研究领域也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汉学家写就的,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完成于1880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也是由俄国汉学家完成的,1892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完成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我想了解一些有关《中国文学史纲要》的撰写背景和它的创新之处。

李:关于瓦西里耶夫的情况,不少人都熟悉。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汉学家,他懂多种语言,对中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佛教研究有俄文版和德文版,本来准备写三卷,可惜未能全部出版。他留下不少手稿,其中有玄奘《西域记》的翻译稿,但因手稿字迹不清,现在也无法出版。

《中国文学史纲要》的撰写与著名学者科尔施的一项出版计划有关。当时他想编写出版《世界文学史》,其中包括中国文学部分。瓦西里耶夫由于多年来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的缘故,所以承担了这个任务。《中国文学史纲要》比起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写成的类似著作早了20多年,而且它涉猎的面很广,不单是纯文学的作品,这与作者认为文学是一切文章典籍的总和的观点有关。当然,这部著作最值

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主要还是他谈文学的部分。这部著作有许多创新的地方。作者认为《诗经》是一部真正的民间诗歌集,他反对儒家对这个卓越文献的传统解释。瓦西里耶夫也是汉学界第一个倡导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民歌的学者。他指出:“如果有人对今天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不同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这些话比刘半农等人开始收集中国现代民歌早了30年。

我特别注意到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对中国戏曲、小说和弹词的介绍,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对中国戏曲产生的历史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了它的民间渊源。他指出:“可以设想,具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曲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官方得知民间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他在郑振铎和其他中国学者之前许多年,提出了中国戏剧可能受到印度梵文戏剧影响的观点。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戏曲与小说的关系,他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例证,指出“和欧洲一样,中国人也善于利用历史和小说编写剧本”。他还提到中国有一种诗体小说,指的是弹词。他认为不应该忽视这些“语言俚俗”的作品的存在。

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与欧洲文化的交流中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鲜明,它将融入欧洲的思考、学识和精神,但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和特点。这样的观点应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与各国文学交往的扩大,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征,但是中国新文学并没有完全脱离民族传统,从中国优秀的现代作品中仍可以找到传统的因素。

陈:不仅是汉学家,俄国不少优秀的作家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中国文化发生过关联。当然,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以及所持观点的差异,俄国作家的态度是各个不同的。如别林斯基认为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很高的发展层面,但是不同意汉学家比丘林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泛美之词。冯维辛、拉季谢夫、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也都对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但由于他们无缘来到中国,在表述中常常有隔膜感。

契诃夫当年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